

孙昌武 注评

韩愈
诗文选评

名家注评
古典文学丛书

三秦出版社



序

言

一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政治活动家。他的郡望是昌黎,因称“韩昌黎”;曾任吏部侍郎,称“韩吏部”;死后谥曰“文”,称“韩文公”。有文集四十卷附外集十卷、遗文一卷传世(称《韩昌黎集》或《昌黎先生集》等);另有《论语笔解》(题与李翱合著),是否所作尚待考定。

韩愈活动在中唐时期德、顺、宪、穆四朝,这正是国家矛盾丛生、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经过“安史之乱”,一度呈现为“盛世”的唐王朝在急剧地走下坡路。大乱之后,朝廷外部有羸弱不安的强藩和边疆少数民族步步侵逼,内部则阉宦弄权,朝官党争,政出多门。而肃、代、德宗几代皇帝都不思或难以振作,结果是内忧外患,动乱连年,经济衰敝,国事日非。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形势下,思想文化领域又弥漫着颓败、消极的风气。在汉代被确立为统治思想理论的“儒术”,一乱之于汉、魏的谶纬神学和玄学,再乱之于晋代以后呈泛滥之势的佛、道二教。到唐代,得力

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和提倡，佛、道二教更发展到极盛。在动荡衰敝的局面下，统治者更沉溺于宗教幻想和迷信而难以自拔。韩愈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和思想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本书后面附有韩愈简谱，记载了他的生平大节，可以参阅。从简谱可以看出，韩愈仕途相当坎坷，而一生奋斗却相当执著。他的一生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段落。贞元十九年（803）末即三十七岁之前，他如当时一般的士大夫家庭出身的青年人一样，求举觅官，但并不顺利。所谓“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上宰相书》），是说经过四次考选才于贞元八年中进士，经过三次吏部科目试也没有获选做官。结果他宦途、生计两无着落，不得不在五年间先后到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和徐州（今安徽徐州市）节度使府作幕僚。直到贞元十七年三十五岁的时候，他才正式入朝为官，但只被任命为冷落学官、正七品上的四门博士。

这时已是德宗晚年，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一派新进官僚依靠将要即位的太子李诵（唐顺宗）逐步把持朝政。这一派具有变革意识的人物和保守派的斗争渐趋激化。贞元十九年（803）冬，韩愈先是被提升为监察御史，接着被贬官到岭南的连州阳山县（今广东阳山县）任县令。关于他这次致贬的原因，文献记载纷纭，此不赘述。从资料所述蛛丝马迹，可以判断是因为他与当时正在得势的改革派相冲突而被排斥。他在流贬中度过了两年半困顿生活。这已是他第二次来到岭南。他自幼父母双亡，就养于兄长韩会。十岁的时候，韩会贬官岭南，他曾随赴贬所。这些经历给他的刺激和教育应是相当深刻的。

唐宪宗李纯即位，革新失败，朝廷政局又一次剧烈变动。主持变革的“二王”（王叔文、王伾）、刘（刘禹锡）、柳（柳宗元）等被严贬。韩愈先是量移荆州（今湖北江陵市），然后又回到朝廷。直到元和八年（813）四十六岁被提拔为比部郎中，一直未得大用，多数时间在长安和洛阳坐学官冷板凳。他大志不得伸张，理想不能实现，甚至生活都困顿不堪。他当初是受到改革派打击，如今又不为当权者所喜。这固然由于他个性刚正不阿、遇事不随，更和他的政治态度有直接关系。他是个坚守儒家圣人之道的理想主义者，当初对改革派的激进作风和朋党习气不能苟同，后来又对现实中的各种弊端和不平取批判姿态。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矫矫亢亢，恶圆喜方”（《送穷文》），“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进学解》），勇于任事，特立独行，当然要“跋前踖后，动辄得咎”了。

元和八年韩愈出任比部郎中，才算接近朝廷统治集团的核心，也有可能担负起更重要的职责。比部郎中是尚书省刑部属下比部的长官，官阶是从五品上。按唐代叙官制度，五、六品间是个重要界限。五品以上算是“常参官”，六品以下则只朝朔、望。“常参官”算是有资格直接参与朝政。韩愈从担任尚书郎官，到他去世的十一年间，出任过各种要职，担负过重要使命，但也经受不少挫折。他曾被裴度辟署为幕僚出讨淮西，也曾赴镇州宣慰乱军。这是两次轰轰烈烈的行动，他都立下大功，受到褒奖。而也是在这一时期，他上书论谏奉迎佛骨，险遭杀身之祸，并再次贬官岭南任潮州（今广东潮州市）刺史。宪宗一朝，在走下坡路的唐王朝颇有振作气象，韩愈可以说是为

振作朝纲而积极奋斗并做出一定贡献的干员之一。他去世那一年,宪宗被宦官谋杀,藩镇乱态复萌,朝廷一度振作的势头很快又丧失殆尽了。

韩愈就这样在时代动荡和磨难坎坷中度过了波折的一生。他一身荣辱升黜与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密切相关,他以坚定的理想和无畏的胆识积极参与现实斗争,发挥了影响,做出了贡献。

二

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韩愈以倡导“儒学复古”、排诋佛、道著称,是儒学由汉学向宋学过渡的代表人物。对于韩愈,提倡儒学和反对佛、道是指导他思想和行动的统一理论主张的两个方面。他从事文学创作当然也在这种理论主张的指导之下。他提倡“古文运动”,实际就是以振兴儒学为归宿。他的诗文创作的成就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的思想理论水平。

从历史发展看,提倡儒学,反对佛、道,南北朝以来代有其人。隋、唐之际的“大儒”文中子王通、初唐史学家刘知几等都是这方面的著名人物。唐王朝开国伊始即兴办国学,尊崇先儒,修撰《五经正义》,如此等等也都是振兴儒学以巩固统治秩序、维护思想统一的具体措施。当时的文人大体亦以儒学为安身立命的依据。唐代文学革新的开创者陈子昂已有意识地提倡风雅兴寄,其观念显然主要是来自儒家的。大诗人杜甫自诩“奉儒守官”(《进雕赋表》,《杜少陵集详注》卷二四),李白慨叹“《大雅》就

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五十九首》之一，《李太白全集》卷二），也是以儒家后继自命。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形势衰败，社会危机加深，在一些有识之士看来，重新振兴儒学传统、发扬儒家经世之旨和伦理道德乃是挽救社会的主要或惟一的途径。散文的“古文运动”和诗歌的“新乐府运动”都以这样的思想观念为背景。当然，“运动”一语是现代人的观念，把提倡儒学复古的人视为一个政治“派别”，称韩愈为这一派的“领袖”等等，也是借用现代用语的提法。但韩愈确实为提倡儒学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建立起历史功绩，从而也确立起其在思想史、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韩愈赢得崇儒术、辟佛、道的领袖地位，成为后代张杨儒术的一面旗帜、陪享孔庙的贤人，是有理由的。相比较而言，尽管提倡儒家“圣人之道”的人历来多有，但很少有人态度像他那样热忱、坚定，学理像他那样明确、系统。更有主、客观两个方面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就客观条件而言，韩愈活动的德、顺、宪朝，正是佛、道在朝廷支持下大肆泛滥、造成各方面（包括经济方面）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这就使振兴儒道显得特别迫切，斗争形势也更为激烈，从而韩愈的努力也就显现出明确的目的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就主观方面而言，韩愈的个性坚定、执著，行动一贯。他热情地聚集同志，招引后学，广为宣传，造成声势，从而使得自己的主张发挥出更巨大的影响，得到广泛认同。他的优势从比较中可以清楚看出来：柳宗元倡导“古文”，是他的盟友，同样主张“圣人之道”，但却又信仰佛教，热衷佛说，这也就大为降低了他在思想领域的成绩和地位。

本书选录的《原道》是韩愈崇儒反佛的纲领性文字，《与孟尚书书》则明确阐述了对于思想领域形势和个人使命的看法。在前一篇文章里，他一方面严格区分儒家“圣人之道”与佛、老之道的界线，这在以前和当时的许多文人的观念里往往是绞绕不清的；另一方面精辟地阐述了他所谓“圣人之道”的具体内容：“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这即明确提出了儒家传统的仁义道德之说。他视这个道为维持人类生存纪纲的大经大法，有着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历代圣贤相传的统绪。后来宋儒据以发展为“道统”说。在后一篇文章里，他形容当时形势是“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乱而不收”，“汉氏已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寢以微灭。于是时也，而唱释、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他表示要在这种危急形势之下，担负起力挽狂澜的重任，“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类似言论屡见于他的文字，其认识之明晰与痛切、救世的担当与热忱以及那种紧迫、危重的感情，极富感染力，今天读之仍令人心悸神动，感慨不已。

韩愈辟佛、道，主要目标在佛教。这是因为佛教在唐代发展到极盛，并且对比道教之主要发展于社会上层，赢得社会上下更广泛的崇信，在思想文化领域也造成更大的影响。历来有人指出，韩愈辟佛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少新意。他攻击佛教的，不外乎妖言惑众，败坏纲常，不事生产，危害民生等等，都是前人批判佛教的陈词。但他辟佛的态度确乎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坚定和彻底，更一再表述为达目的而万死未悔的决心。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佛

教在当时最显著的弊端,不在其教理、教义,而在于对社会经济、政治特别是一般民生的危害。韩愈在这些方面的批判恰恰是切中要害的。

韩愈以儒家“圣人”相号召,但实际他并不是要复古、孟之古。他的“复古”是着眼现世的。一方面他发扬了儒家重视道义、关注民生的传统精神。在《原道》里,他把所谓“圣人之道”定义为社会各阶层“相生养之道”。这种“道”体现于民生的衣食住行,社会的礼乐刑政,因而他主张国家统一安定,反对割据战乱,关心民间疾苦,批判贪黷昏庸。这都显示了他所提倡的儒道的现实精神。另一方面,他所主张的儒家又不是封闭的体系,对各家各派学说颇能批判地加以吸取。比如他认为法家荀子是“大醇而小疵”,“与孔子异者鲜矣”。这是因为发扬荀子的法治思想对于当时纪纲败坏的局面有针砭作用。他激烈地反对佛教,要求“人其人,火其书”,但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他又“沟通儒释心性”学说,“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88页)。这样,韩愈在广泛汲取各家各派的思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赋予儒道以新鲜的现实内容和表述方式,从而他无论是在思想理论还是治学方法上,都给宋代新儒学的建设作了准备,从而成为思想文化领域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加之他具有苏轼所称赞的“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韩文公庙碑》,《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五)的品格,表现出一一般古代优秀士大夫引以为豪的大无畏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志,从而成为历史上张扬儒道的

旗帜和榜样。

三

韩愈的创作诗、文、赋等各体兼擅，特别是散文和诗歌取得了更杰出的成就，并造成深远影响。他倡导、创作“古文”的成就尤为突出。但本书按编选文集惯例，诗居文先，所以先讨论韩愈的诗。

中唐贞元、元和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出现了唐代诗歌创作第二个高潮。这一时期和盛唐类似，名家辈出，名作如林，发展形势更有个重要特点，就是形成一批风格各异的创作流派。韩愈及其友人孟郊等人的“韩孟诗派”就是其中成绩巨大、影响深远的流派之一。

韩愈的诗歌创作在盛唐李、杜等大家之后另辟蹊径，走趋奇尚险一路，风格以奇崛高古著称。这当然取决于他的个性和审美趣味，也与他的坎坷人生、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直接关系。他对独创性的追求，他对特立独行人格的赞赏，他本人的桀骜不驯的个性和愤世嫉俗的心态，在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里鲜明地体现出来。

唐代是诗歌格律臻于完美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大家都在近体格律诗创作中逞其才华。而韩愈最用力处、也最能体现其风格和成绩的却是古诗。本书也选了几首律诗和绝句，从中可以看出他在运用格律方面的娴熟技巧和杰出才华，但这些作品基本都写于晚年。那时他的生活已比较平顺，心情也渐趋平静，欣赏景物，咀嚼感受，颇写些清新雅致的小诗。但它们不能代表他的风格，也不是他的

成就的主要所在。真正显示其风格特征和创作成就的是五古和七古,这些体裁篇幅长短自由,格律也较少限制。五古节奏短促,适宜于叙述和描写;七古音调漫长而富于变化,更适于抒情和议论。而这两种诗体都能包容更广泛的题材和更复杂的内容。如本书所选《此日足可惜赠张功曹》叙写生平经历,《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涉及政治变故,是反映社会生活全景的;《叉鱼》描写捕鱼,《雉带箭》描写射猎,则刻画生活中的具体场面;《石山》记游踪,《寄卢仝》写讼案,《石鼓歌》发思古之幽情,《华山女》揭佛、道的弊害,还有本书没有入选的描写鼾睡、落齿、山火、疟疾等等的诗,奇崛的特点首先在这些题材选择上体现出来。

韩愈诗风奇崛又具体表现为两种趋向:一种是雄奇高古,一种是奇险怪异。从审美角度看,人们更容易接受和欣赏前者。属于后一类的名篇如《陆浑山火》、《月蚀诗效玉川子作》、《南山诗》等涉想奇诡,多用奇字僻典,过于艰涩难解,本书没有选录。从本书所录《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一诗大体可以窥知这种诗风的面貌。显示出雄奇高古气魄的如《岳阳楼别窦司直》、《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石鼓歌》等篇,意境高远壮阔,表达雄豪恣纵,遣词用语,探幽索微,千锤百炼,戛戛独造,创造出奇伟不凡、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

韩愈诗在行文体制上的重要特点是所谓“以文为诗”。古代诗、文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表现特征和写作规范。在韩愈以前,特别经过盛唐诸大家的努力,这些方面都已经十分完善。而发挥诗歌体裁和形式的独特功能,本是诗人才华和技能的具体体现。韩愈却着力打破

诗和散文的界线,从而开拓出诗歌艺术的新生面。韩愈的“以文为诗”绝非是诗歌艺术的倒退或淡化,乃是追求更自由的艺术表现的新的创造和升华。“以文为诗”具体表现在写作方法上是所谓“散文化”:节奏、韵律比较自由,用语修辞更加自然。以节奏而论,汉语诗歌以两个字为一个节奏(西语叫做“音步”),五、七言诗分别是2、2、1和2、2、2、1节奏,但韩愈诗常常打破这种格式,比如使用3、2或1、4或4、3等节奏。如此句法看似散漫,却给人以生峭奥折的感觉,恰可配合或愤郁、或激昂的情绪。又唐代格律诗发达,特别到中唐以后,写古诗一般多用律句,但韩愈却往往有意避免排比、偕偶,句式力求“散文化”。他又好用窄韵、险韵,押韵用奇词怪字,这也体现他求奇尚异的风格。加上他多用奇语僻典,如此等等,都一反诗歌创作的流行趋向。他的诗更把杜甫“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稹集》卷五六)的铺叙技巧进一步发挥,叙写描摹,极力铺排,不避琐细繁复。由于注意到诗思的波澜起伏,表达仍不失诗情的优美和委婉。欧阳修评论韩诗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陈寅恪则称赞说韩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95页)。这都相当精辟地说明了韩诗的艺术特征和成就。当然,他的有些诗表现上过分追求诡异,遣词造句往往“生割”,更有些作品生涩难解,还有些缺失韵味,则不能不说是弊病。

韩孟诗派在中晚唐颇有势力，对后代也广有影响。属于这一派的诗人如孟郊、李贺、卢仝、马异等在创作上都取得了可观成绩。明显受到这一派诗风熏染的还有贾岛、姚合等开创的“武功诗派”诸人。从长远看，韩诗对宋诗影响巨大。中国诗史上唐、宋诗风明显不同：唐诗重意兴情韵，宋诗主筋骨思理；重意兴情韵则多用兴象，讲究意味深长；主筋骨思理则多用议论，讲究思致细密。这样，宋人往往“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宋人尊杜甫，因为用诗来议论，以诗做铺陈，杜甫已开启端倪。韩愈对杜甫的这一方面更加发挥，至宋人蔚为大国，遂开创诗歌创作另一番境界。由此可以知道韩愈在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至于唐、宋诗的优劣之争，由来已久，说起来复杂，此不具论了。

四

韩愈创作成绩更大、影响也更为长远的，是在文的方面。他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之一，成功地领导和实现了古代散文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开创了中国散文史的新局面。他的友人刘禹锡颂扬说：“……（在）贞元中，帝鼓熏琴，奕奕金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于高岑，鸾凤一鸣，蝻蟠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犖金如山……”（《祭韩吏部文》，《刘禹锡集》卷四〇）后来苏轼更有“文起八代之衰”的赞誉（《韩文公庙碑》）。

具体分析韩愈在“文”的方面的贡献,应当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他倡导散体“古文”,批判浮靡雕琢的骈文,从而推进和完成了六朝后期即已有人倡导的文体的解放和变革。汉、魏以来,文章写作逐渐“骈骊化”,其主要特征是追求句式整齐、排比对偶,讲究文词藻丽、使典用事。而用这种高度程序化的形式来表现空洞或颓废的内容,就造成一种浮华淫靡的文风。这种骈骊文体正适应六朝贵族文学的需要,成为当时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文体。而早在文体和文风“骈骊化”极盛的六朝后期,已有人出来加以抵制和批评。唐王朝建立以后,改革文体的呼声日益高涨,陈子昂、刘知几、李华、萧颖士、元结、独孤及等几代人都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到中唐时期,文体和文风革新已经积累起丰硕的成果,形成相当大的声势。所以革新的成功不能只算作韩愈个人或与他志同道合的一批人的功劳。但尽管前人的业绩不可忽视,却不能不承认韩愈和与他同道的柳宗元作为“古文运动”领袖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无人比拟的功绩。他(还有柳宗元)总结了历史上文章写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探索出推陈出新的路径。他所总结出的写作理论,主张明确、系统,并以个人卓越的实践树立起典范;他又大力宣传鼓动,援引同道,教导后学,因而形成一个革新文体的“运动”。正是在他和他的战友柳宗元等人的努力之下,古文创作一时间席卷文坛,替文体和文风革新奠定下全胜之局。韩、柳文章从而为后人树立起一种文体范本,此后这种“古文”即成为文坛的导主体裁,直到“五四”运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应当指出的是,以韩、柳为代表的唐代“古文”家改

革文体、文风是以“复古”相号召的。他们在言论中极力称赞先秦、盛汉文章，对魏、晋以下则加以贬抑。但实践中他们并不漠视或否定六朝文章的艺术成果。从历史发展看，魏、晋及其以后正是“文学的自觉”得以突显和发扬的时期。骈骊文体的特征，如排比对偶、讲究音律、使典用事、追求藻饰等等，本来都是汉语文学的表达手段，本身并没有良莠的区别，只不过追求到极端，形成程式，又用来表现特定的内容，就变成雕绣藻绘、不适于用的文体了。而韩愈等人在实践中颇能取分析、鉴别的态度和方法，充分吸收包括骈文在内前人写作所取得的艺术成果，在在含英咀华，撷取精粹，经过去芜存精的功夫，使成为“古文”创作的艺术滋养。这样，他以“复古”为名，创新为实，在广泛汲取前人艺术成果的基础上，创作出义正词严、文采焕发的新型“古文”。可以看看本书选录的《张中丞传后叙》，其记人叙事，确乎继承了《左》、《国》、《史》、《汉》的传统，但其描摹形容的技法，圆融流利的语气，整齐顿挫的节奏，显然对六朝文字多所借鉴。而如《进学解》、《送穷文》等代表名篇，更是骈、散间行，奇、偶并用，兼有浑朴自然和沉博流丽之美。刘熙载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艺概》卷一《文概》）

韩愈散文的贡献还表现在另一个大的方面，即在文学散文创作方面的巨大成绩和影响。众所周知，古代的“文”、“古文”等概念不同于今人所说的文学散文。如何界定一般文章和文学散文是中国散文史研究的一大难题。比如先秦诸子著作，一般是算作文学散文的，但宋、明理学家文章则不被当做散文；《左》、《国》、《史》、

《汉》被当做历史散文的典范,但后来的许多史书就不在文学史讨论之列。就韩愈创作的具体情况而论,其全部作品,包括本来是哲学论文的《原道》、政治论文的《争臣论》等,以及表奏、书序等各类应用文,基本都被看做是文学散文,作为散文史的研究对象。这里涉及对中国散文本质和特征的认识,也直接关系到对韩愈文章的性质和价值的评价。

纵观古代文章的发展历史,上古的甲骨、钟鼎,经、史、诸子的文章之“文”、文化之“文”,确实包含着一定的文学因素,或者说具有文学性质,所以文学史上把它们当做散文的一体来对待。随着文体的演进,这种笼统的“文”逐渐分化了:有些作品文学因素或者说文学性质更加浓重了,另一些则相反地淡化了。这种变化当然是文学史上的大事。长期变化中有两个关键时期,或者说是里程碑。一个是魏晋时期:“四部”分,文集立,“文学的自觉”观念形成,作为艺术创作的“文”逐渐被从一般的文章著述中独立出来;再一个就是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古文”本是以先秦、盛汉散体文章为楷模的,但新一代“古文”家们并没有回归到拙朴无华的文章之“文”、文化之“文”的老路上去,而是在艺术表现上精益求精,使语言和形式更具审美和欣赏价值,从而把古代散文艺术提高了一大步。这样,韩、柳等人的古文就为文学散文树立起新的典范和标准,开拓出以后散文发展的方向。从宋代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古文直到清末的桐城派古文,都是在韩、柳等人开拓的道路上前进的。这是韩愈在一般的文体、文风革新的成就之外,对文学散文发展的贡献。

本书选录韩愈文章,基本按传统文体划分,分为论

说、杂文、书序、记叙、碑状、哀祭、铭颂、表奏等八体。各体文字本来各有体制上的要求和特征，韩愈在各体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不一，但所选作品作为文学散文大体颇具创造性，表现技巧和语言艺术也都相当杰出。

本书选录论说文字《原道》、《师说》、《争臣论》等五篇。它们说理论事，立一家之言，本来上承诸子之余绪。其特点在气势雄肆，笔有断制，或立或驳，语无游移，具有高屋建瓴之势；结构上匠心布置，语言则力求形象生动，又采用多种多样的表达和修辞手法，其词采文章都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征。

杂文《圻者王承福传》、《进学解》、《送穷文》等六篇，最近于现代意义上的“杂文”。韩愈的这类文字体制自由，写法不拘一格，或托喻以讽，或因事立意，语多讥刺，意多感慨，往往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些作品从而成为艺术性十分突出的一类。

书信和送序本来是应酬文字。韩愈文章中这一体最多，本书选录篇目也较多。他的这类文字因事生发，题材不拘，议政论学，述事抒情，无所不有，没有一般应酬文字的客气虚矫之弊，往往有真知灼见寓于其中，有真情实感流露言表。因为所交往多是士大夫中人，摹写世态，抒发感慨，又往往慨当以慷，浩气流转。

韩愈记叙文字写作较少，本书仅选录三篇。但篇篇珠玑并陈，精美绝伦。《张中丞传后叙》是记人的，构思变幻莫测，叙写纵横开阖，人物声情并茂，语言严正峻峭。《燕喜亭记》和《蓝田县丞厅壁记》属于记亭台楼阁一类，都是寥寥短章，有为而发，感慨深长，而运笔变化，更各有特色。

历来有人认为韩文中碑状第一，又曾受“谏墓”之讥。古人写碑志，歌功颂德、隐恶扬善本是通弊。韩愈作品里也有这一类的。但他的优秀的碑传文字，却写成一人一样的卓越传记文。他善于根据碑主的特点，传神写照，穷形尽象，更精心剪裁，巧妙构思，阐发有意义的主题。特别是替那些落拓友人所写的碑志，更是感慨淋漓，情溢言表。

本书选录哀祭文三篇。一篇祭古人，两篇祭亲友，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特别是祭亲友的《祭十二郎文》和《祭柳子厚文》，真是一字一泪，血泪满纸。他把自身郁积的愤懑和感慨都在哀悼和纪念里发泄出来，做成抒情的美文。

铭赞讲究精赅切实，立意深刻。韩愈的这类文字出语峻厉，用意刚正，真正是义正词严，雄浑老健。

表状本是上奏朝廷的公文。中国古代有直言谏诤的传统，由此这一体文字颇有可读的好文章。本书选录的《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论佛骨表》揭露时弊，抨击朝政，可称典范的政论文字。特别是后一篇，议论侃侃，气盛言宜，用语激烈，无所顾忌，表现的胆识、勇气更足以令人感动。《潮州刺史谢上表》本是表示悔罪、乞怜的官样文字，但文多寓意，语气亦健，亦可一读。

从以上简单介绍可以看出，韩愈在文学散文创作方面成就是巨大的。而就中国散文发展规律而言，艺术成就主要不在题材和主题，而在表现方法和语言技巧。正是在这些方面，韩愈取得了巨大成就，把散文艺术提高到新的水平，从而也确立了他在散文史上里程碑的地位。宋代大理学家朱熹认为韩愈的儒道并不纯粹，他说韩愈一生“用